

文学变革与文学传统

方锡德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变革与文学传统/方锡德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5

ISBN 7-301-06246-X

I. 文… II. 方…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0701 号

书 名: 文学变革与文学传统

著作责任者: 方锡德 著

责任编辑: 王春茂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246-X/I·062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cn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mm×1168mm 32 开本 14.125 印张 355 千字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介绍新发现的鲁迅十一篇佚文^①

一

明年,是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在这个重大的纪念日到来之前,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告诉大家:鲁迅在“五四”时期的一批重要佚文被发现了!

这批佚文共十一篇。分别以“黄棘”和“神飞”的笔名,发表在1919年北京出版的《国民公报》上。

这些文章是:

《寸铁》四篇。这是一组短小的杂感。载于8月12日《国民公报》的《寸铁》栏中。每篇末尾均署名“黄棘”。

散文诗《自言自语》。在这一总题目下,包括《序》在内,共有七篇。全部署名“神飞”。载于《国民公报》的《新文艺》栏内。它们是:一、《序》(8月19日);二、《火的冰》(8月19日);三、《古城》(8月20日);四、《螃蟹》(8月21日);五、《波儿》(9月7日);六、《我的父亲》(9月9日);七、《我的兄弟》(9月9日)。

这十一篇文章都为鲁迅的作品,是毫无疑义的。

四篇《寸铁》的署名“黄棘”,是鲁迅多次用过的笔名。1912年1月发表于《越铎日报》上的《〈越铎〉出世辞》,同年8月在《民

① 本文系与孙玉石先生合著。

兴日报》上刊载的《哀范君三章》及《〈哀范君三章〉附记》，均署名“黄棘”。到了30年代，鲁迅仍使用这个笔名写了《张资平氏的“小说学”》等四篇诗文。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鲁迅致钱玄同的信。查1919年鲁迅日记，我们看到：8月12日，“下午得钱玄同信”。8月13日，“上午得钱玄同信，即复”。虽然钱玄同给鲁迅的两封信，我们看不到了，但是根据鲁迅日记和8月13日鲁迅致钱玄同的信，我们还是可以做出如下的判断：当署名黄棘的这四篇杂感在8月12日《国民公报》《寸铁》栏中发表后，钱玄同看到了，他立即写信给鲁迅，询问黄棘是不是《国民公报》的编辑孙伏园。鲁迅在8月13日致钱玄同的信中明确地回答：“黄棘不是孙伏公，单知道他住在鲁镇，不知道别的，伏即福源，来信说的都对，写信给他，直寄‘或●●□’（指《国民公报》——笔者）就是，他便住在那里。”^①鲁镇，是此前鲁迅小说《孔乙己》、《明天》中所描写鲁迅故乡的一个地方。鲁迅在这里暗示钱玄同，8月12日《国民公报》上《寸铁》栏的作者“黄棘”，就是他自己的署名。

散文诗《自言自语》的署名“神飞”，也是鲁迅的笔名。鲁迅在1926年12月写的《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说：“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 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的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这里明确说“神飞”是自己用过的笔名。L S是鲁迅1919年8月16日在《国民公报》上发表译文《一个青年的梦》的署名。唐俟是鲁迅1919年前后在《新青年》上常用的笔名。鲁迅将神飞同L S、唐俟这两个笔名排列在一起叙述，说明鲁迅用神飞笔名所写的作品应当也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一点，也是我们断定散文诗《自言自语》为鲁迅所作的一个佐证。

1919年8月7日《鲁迅日记》载：晚“孙伏园来”。《自言自

① 《鲁迅书信集·26·致钱玄同》。

语》的《序》末尾写道：“ 中华民国八年八月八日灯下记。”从这里不难看出孙伏园的来访和鲁迅应他之约开始写作《自言自语》之间的关系。

更为有力的证据,还是这些散文诗本身的内容。我们只要将散文诗《自言自语》同鲁迅在当时和后来的作品比较一下,就不难得出肯定的结论。《火的冰》与后来收在《野草》中的《死火》,显然都是借火的变化和遭遇用以象征先觉者的形象,表达了同一主题。《古城》里少年肩住黑暗闸门而牺牲的动人故事所体现的深刻思想,在一个多月以后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是用政论性的说理做了清晰透彻的表达:“ …… 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至于《我的兄弟》和《我的父亲》那就更清楚了。它们简直就是后来收在《野草》中的《风筝》和《朝花夕拾》中的《父亲的病》的雏形。《风筝》显然是在《我的兄弟》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们的故事情节完全一样,只是《风筝》的内容更加开阔丰满,笔致更加优美熟稔罢了。《我的父亲》同《父亲的病》中的最后一段不仅情节完全相同,甚至连语言也一样。《自言自语》为鲁迅的作品,是无可怀疑的。

多年以来,一些鲁迅研究工作者一直多方寻觅但却未曾见到鲁迅用“ 神飞 ”这个笔名发表的文章。现在,鲁迅用“ 神飞 ”这一笔名所写的文章终于被发现了,而且又是这样多的一组散文诗,这是多么值得欣喜的事啊!

鲁迅同《国民公报》的文字关系是由于孙伏园的约稿而发生的。《国民公报》是研究系在北京出版的报纸,创刊于 1909 年。徐佛苏主编。中间几度停刊。在新文化运动潮流的影响下,它实行改革,聘请蓝公武担任编辑。他当时思想比较激进,对新文化运动取积极态度。在他的革新之下,《国民公报》第五六版开始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除“ 科学知识 ”、“ 世界名著 ”等专栏

外,还专辟“新文艺”栏,登载白话小说和新诗。因此《国民公报》成为当时宣传新思潮的阵地之一。“五四”运动之后,北京大学学生孙伏园参加该报编辑工作,在第五六版上又辟“寸铁”栏,发表针砭时政的杂感。孙伏园原是鲁迅在浙江绍兴初级师范学堂担任校长时的学生。“五四”前后在北大读书时,与鲁迅来往甚密。他担任《国民公报》编辑以后,经常约鲁迅写稿。1919年8月2日,鲁迅在为自己翻译的《一个青年的梦》所写的《译者序》中,这样写道:“昨天下午,孙伏园对我说,‘可以做点东西。’我说,‘文章是做不出了。《一个青年的梦》却很可以翻译。’”鲁迅应孙伏园之约动手翻译的《一个青年的梦》,从8月15日起,“逐日的登在《国民公报》上面;到十月念五日,《国民公报》忽然被禁止出版了”^①,《一个青年的梦》也便遭了“腰斩”的命运。鲁迅说自己介绍这部作品,是用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借他人的器具,来为国中“睡着的人”,“撞一通警钟”。正是在这样热烈而迫切的思想和心境下,鲁迅在翻译《一个青年的梦》的同时,又慨允孙伏园的坚约与催促,写出了杂感《寸铁》四则和散文诗《自言自语》这两批文章。这时候,《新青年》因陈独秀被捕入狱而停刊。《每周评论》也遭到查封。孙伏园负责的《国民公报》的“寸铁”栏和“新文艺”栏,便成了鲁迅的战斗阵地。这批文章的发现,不仅使我们更深地了解了鲁迅与《国民公报》的关系,也使我们看到了“五四”时期的鲁迅寻求阵地、主动出击、永不停息的战斗精神。

二

鲁迅的这十一篇佚文,写作于“五四”运动之后的风云变幻的斗争岁月里。“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运动,学生斗争和工人斗

^① 《鲁迅译文集》第2卷《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

争的结合,冲击了北洋军阀的黑暗政治统治。以《新青年》为首、北京大学为基地的新文化阵营,受到了军阀的镇压。林琴南“五四”运动之前在小说《荆生》中所描写的“伟丈夫”用武力镇压革新派人士,已经不再是封建守旧派的希望,而是已经成为安福系军阀的实际行动了。六月中旬,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陈独秀被捕入狱。《新青年》被迫暂时停刊,《每周评论》在8月30日被查封。与此同时,军阀政府对“五四”运动的基地北京大学也进行摧残。他们出动军警,包围北京大学,捕去大批进步学生。迫使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引咎辞职。七月中旬,安福系军阀竭力安插胡仁源为北大校长。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又行贿收买了几个北大毕业生,利用他们在北大同学中煽动“迎胡拒蔡”的斗争。鲁迅后来说:“‘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①这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就在军阀武力镇压的同时,封建营垒的守旧文人也纷纷出动,对新文化运动猖狂吠。反动阵营企图文武并用,一举扼杀正在蓬勃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鲁迅满怀着对斗争前途必胜的信念,反击封建营垒的进攻,写下了这四篇锋利的杂感和七篇优美的散文诗。在这场捍卫新文化运动的战斗中,鲁迅显示了作为一个革命文学家所独具的战斗本色。

“寸铁”栏中四则杂感的前两篇是针对一个化名“思孟”的人掷出的锋利匕首。“思孟”者,孟子之徒孙也。据说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报界的败类”^②。他效法祖师爷孟子所说的“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用造谣中伤的卑劣手段,污秽不堪的肮脏文字,恶毒攻击以《新青年》团体为代表的新文化阵营。从8月6日开始,北京《公言报》连篇累牍地刊登思孟的一篇长文《息邪》(一名《北

①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② 参见1919年8月8日《国民公报》。

京大学铸鼎录》)。他用为蔡元培、沈尹默、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徐宝璜、刘半农等七人作传的伎俩,对新文化运动及其领导人进行了无耻的诽谤攻击。他说中国发生的新思潮,是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窃取东欧诸论,矫饰邪说,缔结党徒,志存标榜,必祸国罢市罢工之所萌孽也”。说是《新青年》“引过激派学说,昌言共产主义”,用以蛊惑人心;文学革命是“诋孔孟,蔑伦常”,哀叹“一旦介士受惑,太阿倒持,如火斯燎,杯水奚救。俄国之乱,我其续也”。他还竭力为封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林琴南在“林蔡论争”中的失败鸣冤叫屈,说什么“《新青年》等报排击不遗余力,林琴南以治桐城古文名,亦遭诋毁”。他说蔡元培、陈独秀等人为“五四”运动的“祸首”^①。思孟在《息邪》中甚至不惜以无耻下流、污秽不堪的语言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进行人身攻击。

对于思孟的猖狂进攻,新文化阵营以《国民公报》为阵地,进行了揭露和反击。从8月8日开始,在《寸铁》栏中连续发表杂感,对思孟进行“口诛笔伐”。钱玄同、孙伏园等都发表杂感参加了战斗。在所有讨伐思孟的杂感中,鲁迅写得最为尖锐和深刻。鲁迅对军阀政府的御用文人极为蔑视。他首先指出思孟们使用的武器实在“劣得可怜”,而头脑又“昏得可怕”。鲁迅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法,指出思孟这类人虽然能写出洋洋大观的污秽文字,也只是“没本领”,还算不得“邪”。就他能用些鬼蜮伎俩,“做些鬼祟的事”来看,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小邪”,“算不得大邪”。这就将“邪”这顶帽子回敬给了思孟这个反动文人。鲁迅从长期的斗争中总结出宝贵的认识,指出,虽然“造谣说谎诬陷中伤也都是中国的大宗国粹”,古来就很多,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类“鬼祟著作却都消灭了”。思孟这类“不肖子孙”,冥顽不化,还是“层出不穷的做”。可是这类“无价值”的鬼蜮伎俩,只会与时俱

① 以上引文,均见1919年8月6日~13日北京《公言报》。

亡。这就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高瞻远瞩地指出了思孟这类封建卫道者逃脱不了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杂感第三则是针对封建守旧派文人刘少少而发的。刘少少是北京大学哲学研究所的老庄哲学讲师。他曾经无聊地吹捧名噪一时的女演员刘喜奎,所以鲁迅讽刺他为“刘喜奎的臣子”。“五四”运动之前,刘少少就在北京大学“以阴阳乾坤的浑屯话著《太极图说》”,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大谈“道体、循环、气数”^①,大肆吹捧这些“国粹”,同新文化运动宣传的科学和反迷信相抵触。当新文化阵营遭到镇压和围攻时,他又讥骂白话文学是“马太福音体”。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鲁迅无情地嘲弄了刘少少这位大学讲师对中外文化斗争史一窍不通,连《福音书》是革新体都“看不懂”,反而用它来骂新文学运动,真是浅薄无知得可怜可鄙!

“五四”运动之后进行的这场反击思孟和刘少少的斗争,实际上是1919年二三月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与守旧派之间的一场大斗争——“林蔡论争”的继续和深入。思孟之流仍然继承了林琴南的衣钵,以造谣说谎、诬陷中伤等鬼蜮伎俩,施行人身攻击。足见这些封建卫道者们在新文化运动的进军声中,已经走到了何等穷途末路的地步!鲁迅不仅深刻地看到了这场斗争的实质,也看到了这场斗争的前景。他在第四则杂感中以战斗的进化论作思想武器,精辟透彻地分析了中外历史,指出“先觉的人”,历来要被“放逐杀戮”,“中国又格外凶”。但是社会终究要发展,历史永远向前进,即使有一点暂时的黑暗,“光明却总要到来。有如天亮,遮掩不住。想遮掩白费气力的”。鲁迅在这里实际上阐明了一条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发展规则。这种对光明必然战胜黑暗的确信,体现了鲁迅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产生的可贵的革命乐观

① 引自傅斯年《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想》,《新潮》第1卷第6号。

主义精神,它不仅鼓舞了新文化阵营的斗志,也启迪着后人坚定地前行。

三

《自言自语》是一组战斗的抒情散文诗。它充满着鲁迅彻底的反封建精神,蕴含着现实斗争中体味的深邃哲理,披露了一个革命家严于解剖和自责的襟怀。其寓意的深刻和文笔的优美,至今读了,仍然饶有兴味。在《序》里,鲁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江南水乡夏夜迷人的风俗画。在这个背景下,作者写了一个“眼花耳聋”而又喜欢“说三话四”的陶老头子。他“时常闭着眼,自己说些什么”。这一组散文诗,就是鲁迅假托对他“自言自语”中“几句略有意思的段落”的记录。鲁迅故意说这些“段落”“毫无意思”,实际上却是意味深隽,耐人咀嚼的。

《火的冰》和《古城》两篇,是对先觉的革新者的形象而又含蓄的颂歌。《火的冰》想像的新奇和意境的优美,在这组散文诗中也是比较特异的一篇。像“熔化的珊瑚”一样通红的“流动的火”,实际上是鲁迅心目中先觉的革新者的象征。这流动的火“遇着说不出的冷”,即使“结成了冰了”,却仍然保持着像珊瑚一样美的本色。在人们对于火和火的冰“没奈何”这样的描写里,鲁迅歌颂了先觉的革新者永远不可征服的品格。作者寓情于景。他写火,写火的冰,都是为了抒发对于“火的冰的人”的崇敬赞美之情。

比起《火的冰》来,《古城》更富于故事性。它通过在一个即将被弥漫的黄沙埋没的古城里,一个“少年”为了解放孩子,同“老头子”展开的一场斗争,唱出了对于为下一代的幸福而不惜献出生命的觉醒者的一曲颂歌。在这篇象征性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两个对立的形象。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说:

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

鲁迅在这里所说的为下一代勇于“开辟新路”的“中国觉醒的人”,就是他所歌颂的少年形象。那些“不肯解放子女”,而要他们“都做无谓的牺牲”的“长者”,不就是《古城》中所鞭挞的“老头子”吗?散文诗的结尾,含蓄而巧妙地暗示人们,象征旧世界的“古城”被埋没了,觉醒者用牺牲为下一代换取了未来,守旧者只能与旧世界同归于尽。

《火的冰》和《古城》用构思不同的象征性描写,启示人们一些共同的真理。鲁迅告诉人们,像“古城”一样的旧世界的毁灭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它又不会自然倒塌。摧毁旧世界的斗争,“这不是理论,已经是事实了”!为了新世界的诞生和下一代的未来,先觉者要有像“火的冰的人”一样的坚定无畏的品质,要有像少年一样的献出全副生命的自我牺牲精神。

《螃蟹》和《波儿》是色调明快活泼、带有寓言童话性质的两篇散文诗。它们与前两篇歌颂先觉者形象的内容不同,是鲁迅总结了现实斗争中的宝贵经验,向新文化运动中的战友发出的深情告诫。《螃蟹》中的深刻主题是鲁迅通过对生活敏锐而又特有的细腻观察,采用寓言形式表达出来的。它描写了一个老螃蟹在蜕壳新生时与狡猾的“同种”一段风趣的对话。这个饱经沧桑、阅历深广的老螃蟹,亲眼见过多少螃蟹在蜕壳新生时,因为身子软而被同种吃掉。所以他想办法要寻找一个安全的窟穴,使自己得到新生。生活的经历使他一眼就看穿了那个口称要“帮助”他的同种的伪

善面目。他一针见血地回答道：“就怕你要吃掉我。”通过这样一个普通的寓言故事，鲁迅揭示了新旧事物斗争中的规律。它告诉人们，对于那些甜言蜜语而心怀叵测的同种，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波儿》里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单纯的故事：一个天真稚气的孩子波儿，兴致勃勃地种下了蔷薇子，急盼看到蔷薇成长、开花。但是事实却不能如愿以偿。他在“气愤愤”中跑到河边、海边，听到两个孩子的话，仍然没有醒悟过来。作者满怀热情地批评了波儿的幼稚和天真，阐明了创造美好新生的事物中的一个道理：河水不会因为落下一滴泪而变咸，海水不会因为滴了一点血而变红。“世上那有半天抽芽的蔷薇花”呢！鲁迅在结尾中意味深长地说：“便是终于不出，世上也不会没有蔷薇花。”这就更深刻地启示人们：美好的新生的事物的出现，并不是一蹴而就，不仅要付出艰辛的长期劳动的代价，而且也不是一个人奋斗的结果，它需要集体的创造。即使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美好的事物和新的生活总会出现于世上。鲁迅“五四”时期正在发展中的乐观主义态度和集体主义思想，在这里闪着动人的光彩。

《我的父亲》和《我的兄弟》是姊妹篇。这两篇虽然也包含了对封建的旧习惯和“长幼有序”的旧礼教的针砭，但更主要的是使我们看到了作者那种严于自我解剖的精神和坦荡美好的胸襟。两篇散文诗可以说是人的心灵美的颂歌。鲁迅的这种思想和襟怀，到了《野草》和《朝花夕拾》中，得到了更加深刻委婉的表现。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也是一个极富于诗人气质的伟大文学家。这一组散文诗的创作为我们展示了鲁迅诗人的气质和情怀。其中的有些篇思想的深邃、构思的巧妙、文字的含蓄，都显示了“五四”时期鲁迅所特有的战斗风格和艺术造诣。

四

散文诗《自言自语》和四篇杂感的被发现,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五四”时期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1925年11月,鲁迅在编辑“五四”时期的杂感集《热风》之后,写下了一篇《题记》,其中说:“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五四”运动之后,鲁迅是不是有一些作品“散失消灭”了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一些鲁迅研究工作者的脑中。现在,这十一篇佚文的被发现,有力地说明,“五四”运动之后,鲁迅并非“没有写什么文字”,而确实是“散失”了。然而,岁月流逝的灰尘,湮没不了生命永存的文字。今天,它的光辉又闪耀在我们面前。

如前所述,“五四”运动之后的一个时期里,新文化运动处在被黑暗的高压政治禁迫下的艰难时期。新文化阵营所赖以战斗的阵地几乎被摧残殆尽。《新青年》的同人中有的动摇,有的沉寂。鲁迅是不是也搁笔沉默了呢?过去人们知道,从1919年5月出版的第6卷第5号《新青年》发表的小说《药》和《“来了”》、《“圣武”》等四篇“随感录”,到1919年11月出版的第6卷第6号《新青年》发表的论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不满》、《恨恨而死》等六篇“随感录”,在这近半年的时间里,鲁迅除了发表翻译《一个青年的梦》以外,在创作上只写了小说《明天》和《一件小事》。而这两篇小说,又是在十月以后才发表的。这同“五四”以前比较起来,在创作数量上显得急剧减少了。在政治高压下,鲁迅真的停止了呐喊,陷于沉默了吗?新发现的这些充满战斗精神的杂感和抒情散文诗,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作了响亮的回答:鲁迅没有沉默!“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

偏倒的小草。”^①面对军阀政府监禁刺刀的寒气冷光和守旧派文人谣言诬陷的明枪暗箭,鲁迅以无私无畏的精神气概,在他所能找到的《国民公报》这个新辟的阵地上,仍然继续在呐喊着,在战斗着!墨写的事实是历史最坚实的丰碑。这十一篇文章以它的战斗思想和艺术光彩,重新回到卷帙浩繁的鲁迅著述之林,大大地填补了这个时期鲁迅著作上的空白。

在艺术上,十一篇佚文的发现,为我们研究鲁迅的创作开阔了视野。《新青年》在同封建文化的斗争中,创造了“随感录”这一新型的文学形式。鲁迅以他大量的创作实践,使得这一斗争的武器更加丰富多彩。鲁迅不仅有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千字左右的“投枪”,也有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仅一二百字的“匕首”。但后者在“五四”时期鲁迅的杂感中毕竟是很少的。四篇《寸铁》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了鲁迅对这种短小杂感体式更多的运用。当时《国民公报》“寸铁”栏有一篇杂感说:“寸铁本来用以杀人。现在世界虽大,竟至于无人可杀。只好拿来打狗。这真是铁的晦气。”^②该栏编辑还奉告文字太长的作者,要写得短一些,不然“吾们的寸铁栏,要变尺铁栏了”^③。可见这些“寸铁”的战斗作用和短小的特点。鲁迅这四篇《寸铁》,每篇仅有百字,目标集中,一事一议,三言两语,轻便锋利,表现了他根据斗争的需要,使用这一文学形式是怎样的得心应手,灵活多变。

过去人们都知道,鲁迅在“五四”时期对短篇小说、新诗、随感录和论文等文学形式,都进行了探索创造,为新文学做了拓荒的工作。至于对散文诗这种文学形式的尝试,一直认为是写作《野草》才开始的。现在看来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了。据我们了解,中国新

① 毛泽东:《论鲁迅精神——在陕北公学的讲话》(1937年10月19日)。

② 1919年8月8日《国民公报》。

③ 1919年9月17日《国民公报》。

文学运动史上,较早地进行散文诗创作的有刘半农、郭沫若等人,但那是在1920年夏天以至年底才开始的。至于《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杂志大力倡导散文诗的创作,那就更晚一些了。鲁迅写于1924年到1926年的《野草》,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中国现代散文诗创作的丰碑。《自言自语》的发现,使我们第一次看到,早在1919年8月,鲁迅就开始了散文诗这一文学形式的创作实践了。这就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诗这一文学形式的出现和鲁迅对这一形式尝试的时间提前了。从散文诗《自言自语》的写作情况来看,它有序言,各篇有标号,连续发表,现在看到的最后一篇《我的兄弟》的末尾还缀有“未完”的字样。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计划地、成批地进行散文诗创作的第一个人。这说明,鲁迅写作散文诗,不仅是为反封建战斗的需要,同时也表现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对新的文艺形式勇于探索的艺术胆力和创造精神。这批最早出现的散文诗,以它深刻的思想和优美的艺术,显示了新文学创作的实绩,对旧文学起了示威的作用。

《自言自语》这一组散文诗,比起这一时期同类体裁的创作,在艺术上是略高一筹的。但是与五六年之后鲁迅自己的《野草》、《朝华夕拾》比较起来,仍然存在着拓荒时期的某些不成熟的痕迹。如把《我的父亲》、《我的兄弟》同后来写的《父亲的病》、《风筝》略做一些比较,就不难看到后者在艺术上的更加丰润和优美。《自言自语》这一组散文诗的发现,也使我们更加体会到一个道理:即使像鲁迅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也绝不会满足自己已有的成绩,他总是以辛勤的探索和创造去攀登那永无止境的艺术高峰。还是鲁迅说得好啊:“世上那有半天抽芽的蔷薇花!”

1980年3月20~28日于北京大学

锋锐的《寸铁》 光辉永在^①

——读新发现的鲁迅四篇佚文

鲁迅“五四”时期的重要佚文——四篇《寸铁》，最近被发现了。

读着这些简短锋利的文字，翻阅那时“战尘扑扑”的报刊，我们似乎感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争烈火炽热灼人，我们仿佛看见鲁迅手举锋芒熠熠的“寸铁”杀向封建文化营垒的战斗身影。四篇《寸铁》和鲁迅同时期写下的许多随感录一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浮雕上，镌刻下一幅令人难忘的战斗图景。

让我们翻开历史上这难忘的一页吧。

一

鲁迅这四篇署名“黄棘”的短小杂感，全部发表在1919年8月12日北京《国民公报》的“寸铁”栏中。

这时候，“五四”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三个月了，但是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里的新旧斗争仍在尖锐地进行着。在这样一场关系新文化运动命运的斗争中，鲁迅为什么会在《国民公报》上发表这几篇战斗的杂感呢？

《国民公报》创刊于1909年。徐佛苏主编。社址设在北京宣

① 本文系与孙玉石先生合著。